

論法德關係(2)：和解的努力

洪瑞閔

「從根本上來說，法國與德國就是歐洲，德國是心，法國是頭。」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前言

1945年5月8日德國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役宣告結束，但是戰爭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對於歐洲國家來說，歐戰的勝利只是另外一段艱辛歲月的開始，親朋好友死去的創傷有待撫平，百廢待舉的家園有待重建。在法國與德國，有越來越多的政治精英與人民開始反思這一段歷時七十餘年的爭鬥究竟帶來了些什麼？他們認為如果再繼續以零和遊戲(zero-sum game)與復仇的邏輯來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你所得到的就是我所得到的，如果遭受失敗下次必定百倍奉還—則將永遠陷入戰爭的無限輪迴當中。然而，如同二次戰前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與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沒有成功的努力所顯示出的歷史教訓，如何能夠將整體的利益置於國家的利益之上，特別是願意放下國仇家恨與過去的死敵達成和解並非易事，本文將從主客觀的環境來論述為何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與德國¹能夠達成其在

過去所無法達成的和解與合作，並且帶動整個歐洲的整合運動。

劃時代的「舒曼宣言」

1950年5月9日由法國外交部長舒曼(Robert Schuman)所發表的「舒曼宣言」(Schuman Declaration)象徵了法國與德國和解的開端，在宣言當中，法國外長提出確保歐洲和平的願景，而和平則有賴於一個統一的歐洲，這樣的歐洲必須要先消除法國與德國之間在安全上的對立才有可能辦到。

因此，舒曼呼籲兩國將戰爭物資—也就是煤與鋼—共同管理，從根源上徹底去除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舒曼宣言很快得到包括德國在內的其他五個西歐國家的正面回應，1951年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也就是今天歐洲聯盟的前身。「舒曼宣言」的發表與「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迅速成立反映出巴黎與波昂對於

確保和平有著高度共識，雙方都將其視為最高指導原則。

客觀的政治與經濟合作誘因

除了對和平的共識以外，各項政經因素也使得巴黎與波昂的和解與合作變得有必要。在政治面向上，首先，透過合作將有助於擺脫戰敗國的束縛。對於身為戰敗國並且被裂解成兩半的德國來說自然沒有太多選擇的空間，與法國的和解以及在歐洲整合事務上進行合作是快速回復其地位的方式。對於法國來說，儘管屬於戰勝國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擁有否決權的五強之一，但那只是名義上的，在二戰期間法國被納粹德國所擊敗並淪為附庸，若沒有美國與蘇聯的協助，根本沒有收復失地的可能，因此對於一個「衰弱的」戰勝國來說，與德國的和解與在歐洲事務上的合作是其找回昔日法蘭西光輝的方法。再者，我們尚需考量到巴黎與波昂所面臨到的共產威脅。二戰結束後繼之而起的是美蘇對峙的冷戰時代，民主與共產陣營針鋒相對，1950年韓戰的爆發讓同樣身處在兩大陣營對抗最前線的法國與德國感到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自然沒有彼此衝突的空間，必須要放下成見立即合作以面對蘇聯可能的侵略。

在經濟面向上，首先，法國與德國的結合將可以使得市場擴大產生規模經濟，同時透過彼此在煤鋼生產上的協調，也能夠避免生

產過剩與生產不足之情形發生，穩定的環境有利於戰後荒廢多時的經濟復甦。此外，法德雙方在歐洲整合事務上的合作推動也可以回應美國的開放要求，對於當時均仰賴華盛頓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重振經濟的巴黎與波昂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最後，彼此在經濟事務上的合作將可以避免重回保護主義的老路，而後者正是過往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根源之一。

政治菁英和解論述

二次戰後法國與德國除了具備上述諸多合作的政治經濟誘因，政治菁英的論述也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透過語言與行動的使用，政治人物可以在重要的時刻由上而下地改變社會大眾的觀點，重新塑造其對某項事物或問題的看法。

因此，二次戰後法國與德國雙方政治菁英的論述對於法國與德國走向和解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將法德政治菁英的論述分成如下三個層面來解析。

首先，他們大多對過往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重要性表示懷疑甚至厭惡。在德國，戰後首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認為儘管民族國家是歐洲政治人物正當性的來源，但是其重要性將會在未來的歐洲整合中不斷降低，歐體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首任主席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也認為民族國家

已經過時而不會是人類社會最終的組織形式。在法國，歐洲整合的推動者莫內(Jean Monnet)指出過去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民族國家在和平解決國際問題上的無能為力，打破民族國家的疆界是必要的。舒曼則強調儘管在心理層面難以抹滅民族國家的存在，但是無限上綱只會導致陳舊過時的民族主義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

第二，法德政治菁英重視歐洲共同價值的推廣。在德國，艾德諾著重德法和解所能帶來的和平價值，同時德法作為自由民主國家更應該要團結合作共同對抗來自東方的蘇聯極權共產威脅。霍爾斯坦也認為這些價值並非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再發現」，是一個早已存在德法人民之間的事實。在法國，莫內強調和平的重要性，認為唯有法德和解才能為歐洲與世界帶來和平。舒曼則認為唯有透過聯邦的方式才能夠實踐此一和平，法國與德國人民的美好未來有賴於歐洲聯邦的實現。

第三，法國與德國領導人利用關鍵場合做出重大動作宣示，藉此向人民展現兩國和解的重要性。自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與德國總理艾德諾以來，歷任法德的領導人彼此之間均緊密合作，透過共同簽署代表性條約與出席象徵性意義場合的機會來推動和解，消除彼此的仇恨與猜忌，進一步達成合作。如戴高樂與艾德諾在 1963 年 1 月 21 日簽署強化友好與合作的《愛麗榭條約》(Élysée Treaty)，兩位領導人也建立了良好的

私人情誼。此外，更為經典與為人所知的畫面，莫過於 1984 年 9 月 25 號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與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共同出席紀念雙方於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死傷士兵的紀念活動，在儀式當中密特朗與柯爾肩並肩手拉手一同紀念 70 年前造成雙方超過 70 萬人死傷的慘烈戰役。

無論是《愛麗榭條約》或是凡爾登戰役的紀念儀式，我們可以觀察到二戰結束後法德政治菁英有與他們在一戰結束後的前輩們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再像過去在貢比涅(Compiègne)以羞辱的方式對待對方，而是強調共同的悲慘過去，攜手邁向嶄新的未來。

人民之間的互信強化

除了由上而下政治菁英的論述，從民間出發由下而上的方式也是法德和解的重要途徑，《愛麗榭條約》的目標在於透過具體的措施來促進雙方人民的和解以及友誼的建立，其中年輕的族群是雙方政府的主要訴求對象。

透過對彼此語言的學習、學歷的相互認證、學生的交換與學術的合作，希望能夠增加法德人民的相互理解與認識，減少誤解與敵意。相關的合作項目如法德青年辦公室(法語：Office franco-allemand pour la jeunesse)、德法公共電視台(法語：Association Relative à la Télévision Européenne)的設立都在促進雙方的和睦與理解上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結語：法德夥伴關係的成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國與德國的關係開始逐步改善，在巴黎與波昂都渴望和平以及不同的政治經濟因素考量下，法國與德國開始走向和解的道路，一方面，政治菁英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利用論述與重要場合帶動了和解的進行。另一方面，透過制度的創設，雙方人民的互動逐步加深，進一步增加彼此的了解，友誼也得以建立。法國與德國終於能夠擺脫過去的宿怨，當今人們已經不再談論法德和解，因為這早已不是個問題，來自對方的侵略已經是天方夜譚，取而代之的是「法德夥伴」在全球議題上的合作，「法德核心」在歐盟議題上的推動。

因此，法國與德國的和解經驗已經成為一個典範，代表兩個國家能夠在互相殘殺數十

年後在短短幾年內便開始進行和解的嘗試，相較於世界上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地方，法德和解不可不謂一個經典之案例，儘管有其特殊的時空因素，但其精神與做法仍然值得我們借鏡。除了雙方都要有追求和平的渴望以外，客觀的政治與經濟誘因也扮演了催化的角色。除此之外，和解尚須具備更深層與抽象的心理與精神面向之努力，透過政治菁英的帶領與人民之間的交往逐步改變彼此之間的信念、態度、動機與情感，最終使雙方從互相仇視的敵對關係走向和解並轉換成親密的夥伴關係。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

註釋：

1. 有鑑於德國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一分为二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語：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語：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在本文中若沒有特別說明則所提到的德國皆指涉首都位於波昂(Bonn)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本會網址與電子信箱變更

本會因應文化部資安統合，原網站改為文化部統一管轄之公版網站，以下為本會新網址及聯絡信箱：

網 址：fondation.org.tw

聯絡信箱：sfpec.moc@gmail.com

網站移轉期間若有建議及意見，敬請不吝指教，謝謝。